



欽定四庫全書總目

上冊

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

钦定四库全书总目

(整理本)上 中华书局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序

清乾隆时编纂的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从刊行以来，长期成为“家弦户诵”的必备书籍。清末张之洞撰《轩语》，谈到怎样做学问，曾说：“今为诸生指一良师，将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读一过，即略知学问门径矣。”即使在今天，对于有志趣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读者来说，《总目》仍然是能起较好引导效用的工具书。因此，这部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整理本的问世，是值得欢迎的。

《四库全书》综录历代典籍，其规模之宏大远迈前代。据杨家骆《四库全书概述》，“《汉艺文志》著录凡六百七十八部，一万四千九百九十四卷；越时约五百九十四载，而有《隋经籍志》，著录凡六千一百五十部，五万零八百八十九卷；越时约六百五十九载，而有《宋艺文志》，著录凡九千五百四十九部，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七卷。其间公私著录，十数百起，重沓繁复，不可究诘，兹录其要耳。自《宋志》以还，又五百载，而有乾隆开馆修书之举，《四库总目》所录，凡一万零五百八十五种，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卷。惟历代多为守藏之策，而鲜审订之功，求其搜罗古今载籍，审订校理，以便学人之研究者，汉成帝后则惟清高宗耳。”

大家知道，西汉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又命刘向等校理书籍。每整理好一种书，刘向便“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”，写成叙录上奏。这些叙录，汇编为《别录》。他逝世后，刘歆继续父业，最后辑成《七略》，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本。刘氏父子的校讎之学，到乾隆纂修《四库》时，得到空前的发扬，《总目》即系其集中的体现。

《四库》工作的取得成功，如前人所指出，关键是负责学者极一时之选。始终其事的纪昀（晓岚），以博学卓识著称，毕生精力萃于《总目》，竟不再有任何学术专著。李元度所作《纪文达公事略》详细描述了他的有关事迹：“乾隆三十有八年（公元1773年），纯皇帝特开四库全书馆，以河间纪公为总纂官。公贯彻儒籍，旁通百家，凡六经传注得失，诸史异同，子、集支分派别，以及词曲医卜之类，罔不抉奥提纲，溯源竟委。每进一书，仿刘向、曾巩例，作提要冠诸简首，上辄览而善之。又奉诏撰《简明目录》，存书存目多至万余种，皆公一手所订，评鹭精审，识力在王仲宝、阮奇绪之上，藏诸七阁，褒然巨观，真本朝大手笔也。”这些话极尽赞扬，却不能算是溢美之词。

纂修《四库》在事人员，见于乾隆四十七年（公元1782年）清单的多达三百六十人。其间不少第一流学者参加了《总目》的工作，如戴震主经部，邵晋涵主史部，周永年主子部等，都对纪昀多有帮助。由此可见，《总目》是在众多学者集体工作的基础上，由纪昀定稿的，无怪乎能够久享美誉。《郑堂读书记》的作者周中孚便说：“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，无论官撰私著，凡卷第之繁富，门类之允当，考证之精审，议论之公平，蔑有过于编矣。”

指出《总目》以集体工作为基础，绝不是要贬低纪昀在该书撰著中的决定性作用。凡读过《总目》的人都会看到，全书有其一贯宗旨，连文字风格都是相当统一的。其间观点最突出的，是对理学的批评，甚至厌恶。尽管书内经部总叙曾说：“汉学具有根柢，讲学者以浅陋轻之，不足服

汉儒也；宋学具有精微，读书者以空疏薄之，亦不足以服宋儒也。”然而在具体的评鹭上，《总目》就不那么持平了。这固然是乾隆时学术界的共同风尚，纪昀本人的思想性情也于此充分表现。有兴趣的读者，不妨对照一下他在小说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是怎样尽情揶揄理学的。

《四库全书》及《总目》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自有其不足之处。《四库》最为后人诟病的，是其编纂过程同禁毁“违碍”书籍相结合。清廷文网繁密，忌讳众多，给学术文化带来种种祸害，前人论之已详。《总目》除带有这方面烙印外，由于是官修，受着许多约束，令人遗憾的地方不少。当时参预的学者已有感受，后来之人更易洞察，只是不敢公然表达而已。有学者曾经立意写书，也被人力加阻止。清代后期，限制逐渐松弛，但对《总目》失误系统进行纠正的工作，要到清亡以后才可能展开。这方面成绩最多的，当推余嘉锡先生的《四库提要辨证》。

《辨证》的序录，对《总目》的得失与价值，作了恰当的分析评述。其中说：“乾嘉诸儒于《四库总目》不敢置一词，间有不满，微言讥刺而已。道咸以来，信之者奉为三尺法，毁之者又颇过当。愚则以为《总目》诚不能无误，然就其大体言之，可谓自刘向《别录》以来才有此书也。”又说：“今《四库提要》叙作者之爵里，详典籍之源流，别白是非，旁通曲证，使瑕瑜不掩，淄澠以别，持比向、歆，殆无多让；至于剖析条流，斟酌今古，辨章学术，高挹群言，尤非王尧臣、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，故曰自《别录》以来才有此书，非过论也。”余先生于《总目》的缺点指摘最多，而对全书仍予以很高评价，并且自称他“略知学术门径，实受《总目》之赐”。这证明《总目》瑕不掩瑜，其重要性是不可抹煞的。

这部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整理本，广泛搜集研究《总目》诸家成果，以页下注形式散入各条，然后对全书施以现代标点，便于各方面读者阅览使用。整理标点这二百卷《总目》，无疑是非常繁重困难的任务。《总目》虽属目录之学，所涉及的学术范围则极宽广，加上条目体例，言简意深，很多地方不易索解。参加整理的各位学者，在几年的工作中是尽了力的。最近有评论家提出，编书不应讲错误“难免”，可是像整理《总目》这样的工作，有些错误恐怕确实是“难免”的，并不是要找什么藉口，希望读者多赐指教。

整理本曾经过多次审改，为整理出版工作带来了不知多少困难和烦扰。作为审阅人之一，我认为整理出版者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很值得钦敬的。

李学勤

一九九六年九月七日于北京

整理凡例

一、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(以下简称《总目》)完成之后,于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)由武英殿首次刊印,是为殿本。乾隆六十年(1795)浙江官府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殿本重刻,是为浙本。同治七年(1868),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,是为粤本。清代三刻本中,以殿本最佳,以浙本流传最广。此次整理,以殿本为底本,以浙、粤二本为参校本。

二、此次整理工作,以标点、校勘、辨证为三大主要内容,力求反映前人与时贤研究《总目》的全部成果。

三、此次整理,改用标准简化字横排,惟少数改用简化字可能引起歧义者,仍用繁体字。标点则采用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颁行的标准例则,而略作变通。

四、校勘侧重文字,以不同版本之间的互校和底本前后内容的自校为主,间参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所收各书书前提要。凡底本之错误、衍脱及底本与参校本间存在的歧异等,皆得更改、标识,并出校勘文字予以说明。

五、凡底本中经常混用的字,如己、已、巳等,一律径改;凡为避讳而改写、缺笔或删除的字,如弘治作宏治、吾丘衍作吾衍等,亦得径予改正、加笔或补入,为免其繁,二者皆不出校勘记说明。

六、辨证考析内容,主要参考余嘉锡的《四库提要辨证》、胡玉缙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刊正》、崔富章的《四库提要补正》、李裕民的《四库提要订误》等四部专著及相关的近200篇论文,亦收整理者自己的研究所得。凡一人所论者,以其姓名领起;多人共识,或整理者新得者,则以“按”字领起。

七、校勘与辨证统编序号,惟校改之处进入正文,并予说明,辨证则仅作页下说明而不改动原文。

八、《总目》所录之书,凡收入《四库全书》者,在各书书名之后加注影印本文渊阁库书序号、页次;凡名列“存目”者,则标明现存馆藏情况,以便按号索书或检目寻书。

九、为方便读者检索,本书附录书名、著者姓名两套索引。

点校 邓洪波

审校 李学勤

圣 谕

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上谕

朕稽古右文，聿资治理，幾余典学，日有孜孜。因思策府缥緲，载籍极博。其巨者，羽翼经训，垂范方来，固足称千秋法鉴。即在识小之徒，专门撰述，细及名物、象数，兼综条贯，各自成家，亦莫不有所发明，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。是以，御极之初，即诏中外蒐访遗书，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、二十一史，遍布黉宫，嘉惠后学，复开馆纂修《纲目》三编、《通鉴辑览》及《三通》诸书，凡艺林承学之士，所当户诵家弦者，既已荟萃各^①备。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，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，惟蒐罗益广，则研讨愈精。如康熙年间所修《图书集成》，全部兼收并录，极方策之大观，引用诸编，率属因类取裁，势不能悉载全文，使阅者沿流溯源，一一征其来处。今内府藏书，插架不为不富。然古今来，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，或逸在名山，未登柱史，正宜及时采集，汇送京师，以彰千古同文之盛。其令直省督抚、学政等通飭所属，加意购访。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、尺牍、屏幛、寿言等类，又其人本无实学，不过嫁名驰骛，编刻酬倡诗文，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^②。其历代流传旧书，内有阐明性学治法，关系世道人心者，自当首先购觅。至若发挥传注，考核典章，旁暨九流百家之言，有裨实用者，亦应备为甄择。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，向有诗文专集，及近时沈潜经史，原本风雅，如顾栋高、陈祖范、任启运、沈德潜辈，亦各著成编，并非剿说危言可比，均应概行查明。在坊肆者，或量为给价；家藏者，或官为装印；其有未经鏤刊，只系抄本存留者，不妨缮录副本，仍将原书给还。并严飭所属，一切善为经理，毋使吏胥藉端滋扰。但各省蒐辑之书，卷帙必多，若不加之鉴别，悉令呈送，烦复皆所不免。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，注系某朝某人所著，书中要旨何在，简明开载，具折奏闻。候汇齐后，令廷臣检核，有堪备阅者，再开单行知取进。庶几副在石渠，用储乙览。从此四库、七略益昭美备，称朕意焉。钦此。

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旨

军机大臣议覆朱筠条奏，内将《永乐大典》择取缮写，各自为书一节，议请分派各馆修书、翰

① “各”，浙、粤本作“略”。

② “取”后，浙、粤本有“外”字。

林等官前往检查，恐责成不专，徒致岁月久稽，汗青无日。盖此书移贮年久，既多残缺，又原编体例系分韵类次，先已割裂全文，首尾难期贯串。特因当时采摭甚博，其中或有古书善本，世不恒见。今就各门汇订，可以凑合成部者，亦足广名山石室之藏。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，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，责令及时专司查校，将原书详细检阅，并将《图书集成》互为校核，择其未经采录，而实在流传已久，尚可裒缀成编者，先行摘开目录奏闻，候朕裁定。其应如何酌定规条，即著派出之大臣详悉议奏。至朱筠所奏，每书必校其得失，撮举大旨，叙于本书卷首之处，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，未免过于繁冗。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，多有摘叙简明略节，附夹本书之内者，于检查洵为有益。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，即令承办各员，将书中要指隐括总叙崖略，粘开卷副页右方，用便观览。余依议。钦此。

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奉上谕

昨据军机大臣议覆朱筠条奏，校核《永乐大典》一折，已降旨派军机大臣为总裁，拣选翰林等官，详定条规，酌量办理。兹检阅原书卷首序文，其言采摭搜罗，颇称浩博，谓足津逮四库。及考之书中，别部区函，编韵分字，意在贪多务得，不出类书窠臼，是以踳驳乖离，于体例未能允协。即如所用韵次，不依唐宋旧部，惟以《洪武正韵》为断，已觉凌杂不伦。况经训为群籍根源，乃因各韵辘轳，于《易》先列《蒙卦》，于《诗》先列《大东》，于《周礼》先列《冬官》。且采用各字，不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之序，前后错互。甚至载入六书、篆、隶、真、草字样，摭拾米芾、赵孟頫字格，描头画角，支离无谓。至儒书之外，阑入释典、道经，于古柱下史专掌藏书守先待后之义，尤为凿枘，不合朕意。从来四库书目，以经、史、子、集为纲领，裒辑分储，实古今不易之法。是书既遗编渊海，若准此以采摭所登，用广石渠金匱之藏，较为有益。著再添派王际华、裘日修为总裁官，即令同遴简分校各员，悉心酌定条例，将《永乐大典》详悉校核。除本系现在通行，及虽属古书而词义无关典要者，不必再行采录外，其有实在流传已少，其书足资启牖后学、广益多闻者，即将书名摘出，撮取著书大旨，叙列目录进呈。俟朕裁定，汇付剞劂。其中有书无可采，而其名未可尽灭者，只须注出简明略节，以佐流传考订之用，不必将全部付梓。副朕裨补阙遗，嘉惠士林至意。再是书卷帙如此繁重，而明代葺役仅阅六年，今诸臣从事厘辑，更系弃多取少，自当刻期告竣，不得任意稽延，徒消汗青无日。仍将应定条例，即行详议具奏^①。钦此^②。

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谕

前经降旨，博采遗编，汇为《四库全书》，用昭石渠美备，并以嘉惠艺林。旋据浙江、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，购求呈送之书，已不下四五千种，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有旧书呈献者，固属踊跃奉公，尚未能深喻朕意。方今文治光昭，典籍大备，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。用是广为蒐辑，俾无遗佚，冀以阐疑补阙。所有进到各遗书，并交总裁等，同《永乐大典》内现有各种，详加核勘，

^① “具奏”，浙、粤本作“缮折具奏”。

^② 此条之后，浙、粤本有：“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大学士刘统勋等议奏校办《永乐大典》条例一折，奉旨：是依议。将来办理成编时，著名《四库全书》。钦此。”及“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：现在查办《四库全书》之翰林等官，著照武英殿修书处之例，给与饭食。即交福隆安派员经理。钦此。”二条。

分别刊抄，择其中罕见之书，有益于世道人心者，寿之梨枣，以广流传。余则选派誊录，汇缮成编，陈之册府。其中有俚浅讹谬者，止存书名，汇为总目，以彰右文之盛。此采择《四库全书》本指也。今外省进到之书，大小长短参差不一，既无当于编列缥緜，而业已或刻或抄，其原书又何必复留内府！且伊等将珍藏善本应诏汇交，深为可嘉^①。若因此收藏不发，转使耽书明理之人，不得保其世守，于理未为公允，朕岂肯为之！所有各家进到之书，俟校办完竣日，仍行给还原献之家。但现在各省所进书籍，已属不少，嗣后自必陆续加多，其如何分别标记，俾还本人，不致混淆遗失之处，著该总裁等妥议具奏，仍将此通谕知之。钦此。

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谕^②

办理四库全书处，将《永乐大典》内检出各书陆续进呈，朕亲加披阅，间予题评，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，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，则成于纪昀、陆锡熊之手。二人学问本优，校书亦极勤勉，甚属可嘉。纪昀曾任学士，陆锡熊现任郎中，均著授为翰林院侍读，遇缺即补，以示奖励。钦此。

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

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，所有古今载籍，宜及时蒐罗大备，以光册府而裨艺林。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，汇上于朝。旋据各省陆续奏送，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，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。因命词臣分别校勘，应刊应录，以广流传。其进书百种以上者，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，朕畿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。复命将进到各书，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，载明年月、姓名于书面页，俟将来办竣后，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。其已经题咏诸本，并令书馆先行录副，将原书发还，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。今阅进到各家书目，其最多者如浙江鲍士恭、范懋柱、汪启淑、两淮之马裕四家，为数至五六七百种，皆其累世弃藏，子孙克守其业，甚可嘉尚。因思内府所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为书城巨观，人间罕觐，此等世守陈编之家，宜俾专藏勿失，以示留贻。鲍士恭、范懋柱、汪启淑、马裕四家，著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各一部，以为好古之功。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堦、蒋曾莹、浙江吴玉墀、孙仰曾、汪汝璠，以及朝绅中黄登贤、纪昀、励守谦、汪如藻等，亦俱藏书旧家，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《佩文韵府》各一部，俾亦珍为世宝，以示嘉奖。以上应赏之书，其外省各家，著该督抚、盐政派员，赴武英殿领回分给。其在京各员，即令其亲赴武英殿祇领。仍将此通谕知之。钦此。

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谕旨

四库全书处进呈《总目》，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内分晰“应刻”、“应抄”及“应存”书名三项，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，将一书原委，撮举大凡，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，可以一览了然。较之《崇文总目》蒐罗既广，体例加详，自应如此办理。第此次各省搜访书籍有多至百种以上，至六七百种者，如

① “深为可嘉”，浙、粤本作“深可嘉尚”。

② “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谕”一条，浙、粤本无。

浙江范懋柱等家，其裒集收藏，深可嘉尚，前已降旨分别颁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及初印《佩文韵府》，并择其书尤雅者，制诗亲题卷端，俾其子孙世守，以为稽古藏书者劝。今进到之书，于纂辑后，仍须发还本家。而所撰《总目》，若不载明系何人所藏，则阅者不能知其书所自来，亦无以彰家^①藏珍弃资益之善。著通查各省进到之书，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，可称为藏书之家，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。其在百种以下者，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。其官板刊刻及各处陈设库贮者，俱载内府所藏。使其眉目分明，更为详细。至现办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多至万余种，卷帙甚繁，将来抄刻成书，翻阅已颇为不易。自应于《提要》之外，另刊《简明书目》一编，只载某书若干卷，注某朝某人撰，则篇目不繁，而检查较易，俾学者由《书目》而寻《提要》，由《提要》而得全书，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，用昭我朝文治之盛。著四库全书处总裁等遵照，悉心妥办，并著通谕知之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

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《永乐大典》散片各书进呈，朕详加披阅。内宋刘跂《学易集》十二卷，拟请刊刻。其中有青词一体，乃道流祈祷之章，非斯文正轨。前因题《胡宿集》，见其有道院青词、教坊致语之类，命删去刊行，而抄本仍存其旧。今刘跂所作，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，用青词致告，尤为不经，虽抄本不妨姑存，刊刻必不可也。盖青词迹涉异端，不特周、程、张、朱诸儒所必不肯为，即韩、柳、欧、苏诸大家亦正集所未见。若韩愈之《送穷文》，柳宗元之《乞巧文》，此乃拟托神灵，游戏翰墨，不过借以喻言，并非实有其事，偶一为之，固属无害。又如时文为举业所习，自前明以来，通人擅长者甚多，然亦只可听其另集专行，不并登文集，况青词之尤乖典则者乎！再所进书内有拟请抄录之王质《雪山集》，内如《论和战守疏》及《上宋孝宗书》诸篇，词旨剴切，颇当事理，竟宜付之剗。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，并当一律从删。所有此二书，著交该总裁等重加厘正，分别削存，用昭评隘之允。至现在纂辑《四库全书》，部帙计盈数万，所采诗文既多，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。或大端可取，原不妨弃瑕录瑜，如宋《穆修集》有《曹操帐记》，语多称颂，谬于是非大义，在所必删。而全集或录存，亦不必因此以废彼。惟当于提要内阐明其故，使去取之义晓然。诸凡相类者，均可照此办理。该总裁等务须详慎决择，使群言悉归雅正，副朕鉴古斥邪之意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

昨四库馆进呈裒集《永乐大典》散篇，内有《麟台故事》一编，为宋待制程俱撰，具详当时馆阁之制，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，以执政领阁事；又有直秘阁、秘阁校理等官，颇称赅备。方今蒐罗遗籍，汇为《四库全书》，每辑录奏进，朕亲披阅厘正，特于文华殿后文渊阁弃之，以充策府，而昭文治，渊海缥緲，蔚然称盛。第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，而非职掌，在昔并无其地。兹既崇构鼎新，琅函环列，不可不设官兼掌，以副其实。自宜酌衷宋制，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。其次为直阁事，同司典掌。又其次为校理，分司注册、点验，所有阁中书籍，按时检曝。虽责之内府

^① “家”，浙、粤本作“各家”。

官属，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，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。其每衙应设几员，及以何官兼充，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义，列名具奏，候朕简定。令各分职系衙，将来即为定额，用垂久远。至于四库所集，多人间未见之书，朕勤加采访，非徒广金匱石室之藏，将以嘉惠艺林，启牖后学，公天下之好也。惟是镌刻流传仅什之一，而抄录储藏者，外间仍无由窥睹，岂朕右文本意乎？翰林原许读中秘书，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，并许告之所司，赴阁观览。第不得携取出外，致有损失。其如何酌定章程，并著具奏以闻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

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，志节凜然，乃史书所溢，并非嘉名。陈寿于蜀汉有嫌，所撰《三国志》多存私见，遂不为之论定，岂得谓公。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谕旨，封为忠义神武大帝，以褒扬盛烈。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，加“灵佑”二字，用示尊崇。夫以神之义烈忠诚，海内咸知敬祀，而正史犹存旧溢，隐寓讥评，非所以传信万世也。今当抄录《四库全书》，不可相沿陋习，所有志内关帝之溢，应改为忠义。第本传相沿已久，民间所行必广，难于更易，著交武英殿，将此旨刊载传末，用垂久远。其官板及内府陈设书籍，并著改刊，此旨一体增入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

昨四库全书荟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，朕于几余披阅，见粘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。所有各签，向曾令其附录于每卷之末，即官板诸书，亦可附刻卷尾，惟民间藏板及坊肆镌行之本，难以概行刊入。其原书讹舛，业经订正者，外间仍无由得知，尚未足以公好天下也。前经降旨，令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，所有诸书校订各签，并著该总裁等另为编次，与《总目提要》一体付聚珍板排刊流传，既不虚诸臣校勘之勤，而海内承学者得以由此研寻，凡所藏书皆成善本，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

前因汇辑《四库全书》，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，嗣据陆续送到各种遗书，令总裁等悉心校勘，分别“应刊”、“应抄”及“存目”三项，以广流传。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，词意抵触本朝者，自当在销毁之列。节经各督抚呈进，并饬馆臣详细检阅，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，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。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，又复身事本朝，而金堡、屈大均则又遁迹缙流，均以不能死节，颯颜苟活，乃托名胜国，妄肆狂狷，其人实不足齿，其书岂可复存！自应逐细查明，概行毁弃，以励臣节，而正人心。若刘宗周、黄道周立朝守正，风节凜然，其奏议慷慨极言，忠荃溢于简牍，卒之以身殉国，不愧一代完人。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场，材优干济，所上封事，语多剴切，乃为朝议所挠，致使身陷大辟。尝阅其疏，内有“洒一腔之血于朝廷，付七尺之躯于边塞”二语，亲为批识云：“至此为之动心欲泪，而彼之君若不闻，明欲不亡，得乎？”可见朕大公至正之心矣。又如王允成《南台奏稿》，弹劾权奸，指陈利弊，亦为无惭骨鲠。又如叶向高为当时正人，颇负重望，及再入内阁，值逆阉弄权，调停委曲，虽不能免责贤之备，然视其《纶扉奏草》，请补阁臣疏至七十上，几于

痛哭流涕，一概付之不答，其朝纲丛脞，可不问而知也。以上诸人所言，若当时能采而用之，败亡未必若彼其速。是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，足资考镜。惟当改易违碍字句，无庸销毁。又彼时直臣如杨涟、左光斗、李应升、周宗建、缪昌期、赵南星、倪元璐等，所有书籍，并当以此类推。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，本属各为其主，亦止须酌改一二语，实不忍并从焚弃，致令湮没不彰。至黄道周另有《博物典汇》一书，不过当时经生家策料之类，然其中纪本朝事迹一篇，于李成梁后设谋甚害，具载本末，尤足征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，实大有造于明人，而彼转逞狡谋阴计，以怨报德。伏读《实录》，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，师直为壮，神戈所指，肇建鸿基，实自古创业者所莫及。虽彼之臣子，亦不能变乱黑白，曲为隐讳。存其言，并可补当年纪载所未备。因命馆臣酌加节改，附载《开国方略》后，以昭征信。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，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，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，渐至瓦解而不可救，亦足取为殷鉴。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，彼皆忠于所事，实不足罪。惟当酌改数字，存其原书，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，与本朝之所以兴，俾我子孙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，益思兢兢业业，以祈天而永命，其所裨益，岂不更大？又何必急毁其书乎？又若汇选各家诗文，内有钱谦益、屈大均所作，自当削去。其余原可留存，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。或明人所刻类书，其边塞、兵防等门，所有触碍字样，固不可存，然只须削去数卷，或削去数篇，或改定字句，亦不必因一二卷帙，遂废全部。他如南宋人书之斥金，明初人书之斥元，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，其书均不必毁。使无碍之书，原听其照旧流行，而应禁之书，自不致仍前藏匿，方为尽善。著《四库全书》总裁等，妥协查办，粘签呈览，候朕定夺，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

四库全书馆进呈李廌《济南集》，其《咏凤凰台》一首，有“汉徼方秦政，何乃误至斯”之语，于理不顺。因检查《北史·文苑传叙》，亦有“颡颥汉徼，跨躐曹丕”之句，《韵府》因而录入，均属未协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其酷处不可枚举，号为无道。秦后之人深恶痛绝，因而显斥其名尚无不可。若曹丕躬为篡逆，称名亦宜。至汉武帝在汉室尚为振作有为之主，且兴贤用能，独持纲纪，虽黜武、惑溺神仙，乃其小疵，岂得直书其名，与秦政、曹丕并论乎？且自古无道之君，至桀、纣而止，故有指为独夫受者。若汉之桓、灵，昏庸狂暴，遂至灭亡，亦未闻称名指斥，何于武帝转从贬抑乎？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诋毁，南朝臣子称北朝主之名，北朝臣子称南朝主之名。宋之于金、元，金、元之于宋亦然。此皆局于其地之私心，虽非天下之公，尚无伤于正理。若李延寿乃唐臣，李廌乃宋臣，其于中国正统之汉武帝，伊祖未尝不曾为其臣，岂应率逞笔端，罔顾名义，轻妄若此！且朕御制诗文内，如周、程、张、朱皆称为“子”，而不斥其名。又如韩昌黎、苏东坡诸人，或有用入诗文者，亦止称其号而不名。朕于异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，乃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不讳，有是理乎？朕命诸臣办理《四库全书》，亲加披览，见有不协于理者，如关帝旧谥之类，即降旨随时厘正。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，为万世严褒贬，即以此衡是非。此等背理称名之谬，岂可不为改正，以昭示方来？著交武英殿将《北史·文苑传叙》改为“汉武帝”，《韵府》内删去此条，酌为改刊。所有陈设之书，悉心改补。其《李廌集》亦一体更正，并谕四库全书馆臣等，于校勘书籍内遇有似此者，俱加签拟改，声明进呈，毋稍忽略。将此通谕知之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

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《宗泽集》，内将“夷”字改写“彝”字，“狄”字改写“敌”字。昨阅《杨继盛集》内，改写亦然。而此两集中，又有不改者，殊不可解。夷、狄二字屡见于经书，若有心改避，转为非理。如《论语》“夷狄之有君”，《孟子》“东夷”、“西夷”，又岂能改易，亦何必改易？且宗泽所指系金人，杨继盛所指是谗达，更何所用其避讳耶？因命取原本阅之，则已改者皆系原本妄易，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。二书刻于康熙年间，其谬误本无庸追究。今办理《四库全书》，应抄之本，理应斟酌妥善。在誊录草野无知，照本抄誊，不足深责。而空格则系分校所填，既知填从原文，何不将其原改者悉为更正！分校、覆校俱系职官，岂宜失检若此！至总裁等身为大臣，于此等字面尤应留心细勘，何竟未能逐一校正！其咎更无所辞，非他书总核记过者可比。所有此二书之分校、覆校及总裁官，俱即著交部分别议处。除此二书改正外，他书有似此者并著一体查明改正，并谕该馆臣嗣后务悉心详校，毋再轻率干咎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

四库全书馆节次汇进各省送到违碍应毁书籍，朕亲加抽阅，内如徐必达《南州草》所载奸商奸瑄结贿欺君诸疏，俱持论不挠，极为伉直。又如萧近高《疏草》内载其劾大珫潘相等以矿税扰民，宋一韩《掖垣封事》亦有劾东厂及税监李凤、梁永等蠹国病民诸疏，均属详明剴切。又侯震旻《天垣疏略》，以客氏再入禁中，抗章极论，并及于沈淮之交通内臣，亦能侃侃不阿。虽其间若徐尔一之九八分疏，极口诋斥孙承宗，而于温体仁、霍维华等则曲加赞誉，是非倒置，以图荧听。此外亦不过摭拾陈言，固无足取。其余说论危言，切中彼时弊病者，实俱无惭骨鲠。前因明季诸臣如刘宗周、黄道周等立身行己，秉正不回，其抗疏直谏，皆意切于匡正时艰，忠荃之忧溢于简牍，已降旨将其违碍字句酌量改易，毋庸销毁。因复思明自神宗以后，朝多秕政，诸臣目击国势之阽危，往往苦口极言，无所隐讳。虽其君置若罔闻，不能稍收补救之效，而遗篇俱在，凡一时废弛奢乱之迹，痛切敷陈，足资考镜。朕以为不若择其较有关系者，别加编录，名为《明季奏疏》，勒成一书，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，亦可垂示方来，永为殷鉴。况诸臣弹劾权奸，指摘利病，至不惮再三入告，实皆出自爱君体国之诚，而其姓名章疏不尽见于《明史》。朕方欲阐幽显微，又何忍令其湮没弗彰！况诸臣在胜国言事，于我国家间有干犯之语，彼自为其主，不宜深责。非若身入本朝肆为诋悖者可比，原不妨就其应存诸疏，将触背字面量为改易选录，余仍分别撤毁。于办理违碍书籍，似属并行不悖。著交该总裁遴选一二人，详悉校阅，编辑缮录，以次呈览，候朕鉴定。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谕

国初设官分职，不殊周官法制。及定鼎中原，参稽前代，不繁不简，最为详备，其间因革损益，名异实同。稽古唐、虞，建官惟百，内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侯伯，奋庸熙载，亮采惠畴。周则监于二代，立三公、三孤。秦、汉以后，为丞相，为中书门下平章知政事。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，

改丞相为大学士。其实官名虽异，职守无殊，惟在人主太阿不移，简用得人，则虽名丞相不过承命奉行。即改称大学士，而所任非人，窃弄威福，严嵩之流，非仍名大学士者乎？盖有是君方有是臣，惟后克艰厥后，庶臣克艰厥臣。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，其言实似是而非也。至六官即今之六部，《周礼》典制綦详，要亦本于唐、虞司徒、秩宗诸职。外而督抚，自秦、汉以来，所称守牧、节度、行省，即唐、虞十二牧之遗，历朝改革，建置纷如，难以缕数。我国家文武内外官职品级，载在《大清会典》，本自秩然。至于援古证今，今之某官即前某代某官，又或古有今无，或古无今有，尤宜勒定成书，昭垂永久，俾览者一目了然。现在编列《四库全书》，遗文毕集，著即派总纂、总校之纪昀、陆锡熊、陆费墀、孙士毅等悉心校核，将本朝文武内外官职阶级，与历代沿袭异同之处，详稽正史，博参群籍，分晰序说，简明精审，毋冗毋遗。其议政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八旗都统、护军统领、健锐火器营、内务府并驻防将军及新疆增置各官，亦一体详晰考证，分门别类，纂成《历代职官表》一书，由总裁覆核，陆续进呈，候朕阅定。书成后，即以此旨冠于卷首，不必请序，列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刊布颁行，以昭中外一统，古今美备之盛。因首论丞相一官，余可类推。览是编者，其各顾名思义，凛然于天工人代，兢兢业业，夙夜靖共，以庶几克艰无旷之义。钦哉特谕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谕

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所办《总目提要》，内请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冠以圣义、圣谟等六门，恭载列圣钦定诸书，及朕御制、御批各种。所拟殊属茱繁。从前开馆之初，曾经降旨，以《四库全书》内惟集部应以本朝御制诗文集冠首，至经、史、子三部，仍照例编次，不必全以本朝官书为首。今若于每部内又特标圣义诸名目，虽为尊崇起见，未免又多增义例。朕意如列圣御纂诸经，列于各本经诸家之前，御批《通鉴纲目》等书，列于各家编年诸书之前，《五朝圣训》、朱批谕旨、方略等书，列于诏令诸门之前，御注《道德经》，列于各家所注《道德经》之前，其他以类仿照编次，俾尊崇之义与编纂之体并行不悖。至阅其《总目》，特载朕前后修书谕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，所办未为尽协。《四库全书》体大物博，将来书成之日，篇帙浩繁，举何为序。所有历次所降谕旨，刊之《总目》首卷以当序，事属可行。且官撰诸书，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，自不得不如此办理。至朕题四库诸书诗文，若亦另编卷首，将来排列，转在列圣钦定诸书之前，心尤未安。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，然竟似《四库全书》之辑，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，朕不为也。著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，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，俾各为卷首，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。而四库书内，朕所题各书诗文，列在本集首卷，庶眉目清而开帙了然。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谕

昨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《总目》，请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冠以圣义、圣谟等六门，业经降旨，令将列朝御纂、御批、御制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，不必特标名目，并令将卷首所录御题四库诸书诗文撤出，分列御制诗文各集之前，所以示大公也。朕一再思维，《四库全书》之辑，广搜博采，汇萃群书，用以昭垂久远，公之天下万世。如经部《易》类，以《子夏易传》冠首，实为说《易》家最古之书，允宜弁冕羲经。若以钦定诸书列于各代之前，虽为纂修诸臣尊崇本朝起见，而于编排体

例究属未协。况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内，尚有前代帝王论著，以本朝钦定各书冠之，亦有未合。在编辑诸臣，自不敢轻议及此。朕则笔削权衡，务求精当，使纲举目张，体裁醇备，足为万世法制，即后之好为论辨者，亦无从置议，方为尽善。所有《四库全书》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，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后，依次编纂。至我朝钦定各书，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，则体例精严，而名义亦秩然不紊，称朕折衷详慎之至意。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^①

四库全书馆进呈书内，有宋叶隆礼奉敕所撰《契丹国志》，其说采摘《通鉴》等编，及诸说部书，按年胪载，抄撮成文，中间体例混淆，书法讹舛，不一而足。如书既名《契丹国志》，自应以辽为主，乃卷首年谱既标太祖、太宗等帝，而事实内又称辽帝，称“国主”，岂非自乱其例！又是书既奉南宋孝宗敕撰，而评断引宋臣胡安国语，称为胡文定公，实失君臣之体。甚至大书辽帝纪元于上，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，尤为纒繆。夫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僭乱之主，享国日浅，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，分注纪元尚可。若北宋，则中原一统，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，概分注于北辽之下？又引胡安国论断，以劫迫其父开门纳晋军之杨承勋谓“变而不失其正”。时承勋同父被晋围，虑祸及身，乃劫其父致被晋戮，而已受晋爵赏。夫大义灭亲，父可施之子，子不可施之父。父既背叛，子惟一死以答君亲，岂有灭伦背义尚得谓之“变而不失其正”。此乃胡安国华夷之见，芥蒂于心，右逆子而乱天经，诚所谓“胡说”也。其他乖谬种种，难以枚举。朕详加披览，经指驳者数十条。馆臣乃请撤出此部书。朕以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是非万世之公，昨曾著《正统辨》，论断甚明。今《契丹国志》既有成书记载，当存其旧，惟体例书法讹谬，于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。著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，依例改纂。其《志》中之事迹，如祭用白马、灰牛，毡中枯骨变形视事，及戴野猪头披皮之类，虽迹涉荒诞，然与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简狄吞卵，姜嫄履武，复何以异！盖神道设教，古今胥然，义正如此，又何必信远而疑近乎？其余辽帝过举，如母后擅权诸事，足为后世鉴戒者，仍据《志》实书，一字不可易。该总裁等覆阅进呈，候朕亲定，录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并将此旨书于简端，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。特谕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

历代明臣奏疏，向有流传选刻之本，《四库全书》内亦经馆臣编次进呈，其中危言讷论，关系前代得失者，固可援为法戒。因思胜国去今尤近，三百年中，荐臣杰士风节伟著者，实不乏人。迹其规陈治乱，抗疏批鳞，当亦不亚汉、唐、宋、元诸臣。而奏疏未有专本，使当年绳愆纠繆忠君爱国之忧，后世无由想见，诚阙典也。即或其人品谊未醇，而其言一事，陈一弊，切中利病，有裨时政者，亦不可以人废言。至神宗以后，诸臣奏疏内有因辽沈用兵，涉及本朝之处，彼时主暗政昏，太阿倒置，阉人窃柄，权幸满朝，以致举错失当，赏罚不明，其君缀旒于上，竟置国事若罔闻，遂至流寇四起，兵溃饷绝，种种秕政，指不胜数。若杨涟、左光斗、熊廷弼诸人，或折冲疆场，或正己立朝，俱能慷慨建议，剴切敷陈。设明之君果能采而用之，犹不致败亡若是之极。其事距今百十

^① “奉上谕”，浙、粤本作“内阁奉上谕”。

余年，殷鉴不远，尤当引为炯戒。则诸人奏疏，不可不亟为辑录也。除《明史》本传外，所有入^①《四库全书》诸人文集，均当广为蒐采，裒集成编。即有违碍字句，只须略为节润，仍将原文录入，不可删改。此事关系明季之所以亡，与我朝之所以兴，敬怠之分，天人之际，不可不深思远虑，触目警心。著派诸皇子同总师傅蔡新等为总裁，其皇孙、皇曾孙之师傅翰林等即著为纂修、校录，陆续进呈，候朕亲裁。书成后，即交武英殿刊刻，仍抄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将此旨冠于简端。所有前派纪昀等选出神宗以后各奏疏，即著归入此书，按其朝代，一体编纂。特谕。钦此。

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

昨阅四库馆进呈书，有朱存孝编辑《回文类聚补遗》一种，内载美人八咏诗，词意嫖狎，有乖雅正。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，孔子不删郑卫，所以示刺示戒也。故三百篇之旨，一言蔽以“无邪”。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，亦当原本风雅，归诸两则，所谓托兴遥深，语在此而意在彼也。自《玉台新咏》以后，唐人韩偓辈，务作绮丽之词，号为香奁体，渐入浮靡。尤而效之者，诗格更为卑下。今美人八咏内所列《丽华发》等诗，毫无寄托，辄取俗传鄙亵之语，曲为描写，无论诗固不工，即其编造题目，不知何所证据。朕辑《四库全书》，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，若此等诗句，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。所有美人八咏诗，著即行撤出。至此外各种诗集，内有似此者，亦著该总裁督同总校、分校等详细检查，一并撤出，以示朕厘正诗体，崇尚雅醇之至意。钦此^②。

① “入”，浙、粤本作“抄入”。

② 此条之下，浙、粤本有“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：《四库全书》荟萃古今载籍，富有美备，不特内府珍藏，藉资乙览，亦欲以流传广播，沾溉艺林。前因卷页浩繁，中多舛错，特令总纂等复加详细雠校，俾无鲁鱼亥豕之讹。兹已厘订葺工，悉臻完善。所有江浙两省文宗、文汇、文澜三阁，应贮全书，现在陆续颁发藏庋。该处为人文渊藪，嗜奇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，藉广见闻。从前曾经降旨，准其赴阁检视抄录，俾资搜讨。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，或至过有珍秘，以阻争先快睹之忧，则所颁三分全书，亦仅束之高阁，转非朕搜辑群书，津逮耆髦之意。即武英殿聚珍板诸书，排印无多，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购览。该督抚等谆飭所属，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，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，许其呈明，到阁抄阅，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，以致稍有遗失。至文渊阁等禁地森严，士子等固不便进内抄阅。但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，如有情殷诵习者，亦许其就近抄录，掌院不得勒阻留难。如此广为传播，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见之书，互为抄录，传之日久，使石渠、天禄之藏，无不家弦户诵，益昭右文稽古，加惠士子盛事，不亦善乎！钦此”一条。按：底本刻于乾隆五十四年，浙本成于乾隆六十年，粤本则成于同治七年，故底本缺五十五年上谕。

进表

多罗质郡王臣永瑔等为奉敕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告成，谨奉表上进者。伏以天玗甄度，书林占五纬之祥；帝镜悬光，艺苑定千秋之论。立纲维于鳌极，函列云珠；媿删述于龙蹲，契昭虹玉。理符心矩，絜三古以垂谟；道叶神枢，汇九流而证圣。治资鉴古，德洽敷文。臣等诚欢诚忭，稽首顿首上言。

窃惟神霄九野，太清耀东壁之星；悬圃三成，上帝扩西昆之府。文章有象，翠妣遂吐其天苞；绘画成形，白阜肇图其地络。书传苍颉，初征雨粟之祥；篆授黄神，始贮灵兰之典。洞庭秘简，稽大禹所深藏；柱下丛编，付老聃以世守。秦操金策，圣籍虽焚；汉理珠囊，遗经故在。儒生密实，维孔鲋之承家；谒者旁求，见陈农之奉使。蝌文以后，篇章自是滋多；麟阁所储，条目于焉渐备。杖吹藜火，夜讎《别录》之编；衣染炉香，坐校《中经》之簿。王仲宝区其流别，定新志之九条；阮孝绪撮其丛残，括旧传之五部。勘书妙画，世摹展氏之图；卷幔飞仙，史载隋宫之迹。唐武德迄乎天宝，钿轴弥增；宋景佑继以淳熙，牙签再录。南征俘玉，元迁三馆之帙；北极营都，明运十艘之楫。莫不前征邃古，丹壶溯合雒之踪；毳发空林，青简弋频斯之篆。西州片札，辨点漆于将磨；南雍残文，检穿丝于已断。竹编未朽，名认师春；瓠本犹携，稿存班固。爬罗纤碎，或得诸玉枕石函；掇拾畸零，均给以螺九麻纸。精缪广购，一篇增十匹之酬；华贖重缙，三品别两厢之等。凡以穷搜放失，猎文林辨囿之精；互镜瑕瑜，立圣域贤关之训。结德輿而辖辖，轨顺经涂；傝学海以沿波，源通道筏。然而掇余易匱，四千卷既丐残膏；骛广弥芜，百两篇更珍贖鼎。丹青失实，或貽诮于王充；朱紫相淆，孰齐踪于郑默。甚乃别风淮雨，惜奇字而偏留；或如许绿绉红，踵驳文而莫悟。兰台度贮，多如贿改漆经；枣板摹传，遂至误尊阁本。故《秘书总目》，郑夹漈复议校讎；而《文苑英华》，彭叔夏重加辨证。从未有重熙累洽，雯华悬紫极之庭；稽古崇儒，册府关丹宸之馆。弥纶宙合，识大识小之无遗；荣镜登闕，传信传疑之有准，金模特建，宝思周融，如今日者也。

钦惟皇帝陛下瑞席萝图，神凝松栋。播威棱于十曲，响震灵夔；洽文德于四溟，兆开神鹭。帝妣歌咏，已题九万琼笺；臣向编摩，更缉三千宝牒。博收竹素，仍沿天禄之名；珍比琳琅，永付长恩之守。乃犹寻端竟委，溯支络于词源；纬地经天，探精微于义海。昭阳韶岁，特细翰府之藏；永乐遗编，俯检文楼之帙。例取诸吴兴韵海，割裂虽多，体宏于孟蜀书林，蒐罗终富。榛楛宜翦，命刊削其澜言；沥液堪珍，敕比排其坠简。焦桐漆断，重胶百衲之琴；古罍铜斑，合铸九金之鼎。复以羽陵蠹剩，或有存留；宛委藏余，不无佚漏。十行丹诏，遍征汲古之家；七录绉囊，广启献书之路。逸经断策，出自大航；杂卦残篇，发从老屋。锦帆挟舵，孟家东洛^①之舡；玉软飞铃，吴氏西斋之轴。鳞排玉字，多王桀之所未闻；笋束金绳，率张华之所莫识。光明茧纸，朱题芸帙之名；蟠

^① “东洛”，底本作“东路”，据浙、粤本改。

屈鸾章，紫认槐厅之印。红梨隔院，曹司对设于东西；青缕濡香，品第详分其甲乙。天潢演派，光连太史之河；卿月澄晖，彩接文昌之宿。总司序录，叨杨亿之华资；分预校讎，列任宏之清秩。银袍应召，骧云路以弹冠；粉署征才，记仙郎而题柱。怀铅握槧，学官愿效其一长；切线割圈，博士亦研其九术。遂乃别开书局，特分署于龙墀；增置抄胥，竞抽毫于虎仆。图与史并陈左右，粉本钩摹；隶与蝌兼备古今，丝痕蛹扁。曹连什五，各隶属于写官；工辨窳良，均稽研于计簿。提纲挈领，董成者职总监修；补阙拾遗，覆勘者官兼详定。庀器预储于将作，棊几筠帘；传餐遍给于大官，珉糜珠馅。温炉围炭，纹凝鸚鹄之青；朗甕涵冰，色映玻璃之白。花砖入直，地同兜率天宫；莲炬分行，人到娉嬛福地。琼箱牒送，全搜滕囊帷盖之余；芝殿签排，共刊木扇金华之谬。程材效技，各一一而使吹；累牍连篇，遂多多而益办。香霏辟恶，拥书何止百城；沈渍隳糜，削稿宁惟两屋！譬入众香之国，目眩瞶于花光；宛游群玉之峰，神愕眙于宝气。岂但鸿都多士，诚闻见所未曾；实令虎观诸儒，辨妍媸而莫决。

所赖恭承睿鉴，提玉尺以量才；仰禀天裁，握银华而鉴物。初披卷轴，共掇零玃，即荷丝纶，务奢完璧。吴澄《易》翼，辨颠倒乎阴阳；杨简《诗》音，斥混淆乎周汉。稗官剿说，删马角之荒唐；译史传闻，摘象胥之讹异。醮章祈福，发凡于刘跂之词；语录参禅，示例于齐熙之记。固已南车指路，陟道岸而衢亨；北斗旋杓，揆文星而度正。泊乎群书大集，品杂金沙，圣训弥彰，鉴澄珠砾。诂经忌凿，黜错简于龟文；论史从公，溯编年于麟笔。立言乖体，四明之录必删；贻古诬真，五柳之名宜辨。七籤三藏，汰除释老之编；五蠹九奸，排斥申韩之术。毒深孔雀，无容校写其青词；巧谢璇玑，未许增添其锦字。小山艳曲，削香奁脂盃之篇；金谷新词，刊酒肆歌楼之句。凡皆词臣之奏进，误点丹黄；一经圣主之品题，立分白黑。至于铜签报夜，紫殿勤披；玉案开缄，丹毫亲咏。五家《易》说，岐涂附辟其传灯；四氏《书》笺，余绪兼详乎括地。前车后鉴，陈风雅于经筵；斜上旁行，寓春秋于世本。庐陵处士，特申僭上之防；安定门人，大著尊王之义。王元杰名同谏狱，为云谷之重儆；洪咨夔迹类探囊，窃玉川之余沈。四箴误注，宁知颜巷之心；二佛同称，转隘尼山之量。《六经》作绘，全收诸杨甲图中；《七纬》成编，知出自庄周书后。五音分配，篆文互备其形声；二史交参，奇字各通其假借。古香醜醜，细辨班《书》；碎腋穿连，重刊薛《史》。清流肇衅，示鉴戒于东林；正统明尊，存纲常于西蜀。派沿涑水，袁、朱之新例兼存；俗记扶馀，班、范之讹传并订。党碑再勒，嗟揖盗而开门；权焰弥张，嗤教星而替月。西湖游迹，殊怜野老之藏名；北使宾筵，深陋词臣之校射。宋抄仅剩，蒐旧志于临安；金刻稀闻，宝遗闻于贞观。或攻或守，徒存十鉴之兵谋；相胜相生，未信五行之德运。建炎政草，愧彼中兴；至正刑章，斥其左袒。李尊洛学，辨道命于天原；鄙注桑书，剖源流于地理。史腴详摘，有逾汉隼之精；经笥悬探，更胜曹仓之富。至于孔庭旧语，首定儒宗；蔡帐秘文，严排异说。范祖禹之《帝学》，具有渊源；曾公亮之《武经》，姑存崖略。横戈危堞，节取陈规；握策灵台，参征苏颂。算穷杪忽，《九章》研鲍瀚^①之藏；术杂纵横，十卷稽赵蕤之撰。楚中隐士，互权韩、柳之评；婺郡名贤，不废吕、唐之学。庐登讖记，衍《洪范》而原非；妄议井田，托《周官》而更误。《钱唐遗事》，深讥首鼠于宋元；《曲洧旧闻》，微憾操戈于洛蜀。绌聪有取，旁通方朔之言；指佞无难，慎听韩非之说。陈思《书苑》，列笔阵而成图；马总《意林》，摹词条而擢秀。黄伯思之博洽，石墨精研；孙逢吉之淹通，云龙遥溯。多知旧事，病歌舞之销金；一洗清波，笑词章之谀墓。《太平御览》，徒粉饰乎嘉名；《困学纪闻》，偶抨弹其迂论。晚唐

^① “鲍瀚”，浙、粤本作“鲍瀚”。